

列寧

論糧食稅



В. И. ЛЕНИН
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М НАЛОГЕ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譯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單行本《論糧食稅》一書排印的，其譯文係按一九四六年俄文版《列寧文選》兩卷集譯出。曾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的原文修改了譯文若干字句。

論糧食稅

(新政策底意義及其條件)

代引言

糧食稅問題現時引起了特別多的注意、討論與爭論。這是十分顯然的，因為它真正是當前情勢下我們政策底主要問題之一。

討論多少帶有一些亂雜性。由於極其明顯的原因，我們大家都犯得有這種毛病。所以不企圖從本問題的「日常」意義而從它的一般原則意義來觀察，才更有益處。換句話說：就是要注視注視現時我們正在動手描繪目前政策中一定實際措施的這全幅圖畫底基本輪廓。

爲了實現這一企圖，我想從我那本「當前主要任務。——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

產階級性」的小冊子中，摘引出一長段話來。這本小冊子已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於一九一八年出版了，其內容：第一，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在報上發表的論布列斯特和約〔一文，第二，是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登出的與當時左派共產黨人的論戰。論戰部分現在已經用不着了，所以我也就把它刪掉。只留下了有關「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及我國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現時經濟基本成份問題的言論。

當時我這樣寫道：

關於俄國現時經濟

（摘自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小冊子）

「……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現時情況說來，將是一個進步。假如說，經過半年，在我國奠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會是極大的成功，並且能够最有效地保證經過一年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將徹底鞏固，而成為不可戰勝的。

我揣測道，一定有人會義憤填膺地起來擰斥這段話……怎麼哪？在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內，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去，能會是一個進步？……這豈不是背叛社會主義麼？正是要來詳細講講這點。

第一，應該分析使我們有權有據能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一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究竟是怎樣的。

第二，應該暴露那班看不見小資產階級經濟條件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乃是我國社會主義之主要敵人的人們底錯誤。

第三，應該真正了解在經濟實質上是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的蘇維埃國家底意義。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分析這三種情況。

大概，還沒有一個人在研究俄國經濟問題時，竟否認到這種經濟底過渡性。大概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也不否認：『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一語係意味着蘇維埃政權是要決心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但總還不是承認現時經濟制度已經就是社會主義的了。

那末，過渡這字又是什麼意思呢？它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制度中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份、部分或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的。但並非所有承認這點

的入都思考到了：俄國現存的各種不同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我列舉出這幾種成份如下：

- (一) 宗法式的，即頗大程度上是原始式的農民經濟；
- (二) 小商品生產（其中包括有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 (三) 私人資本主義；
- (四) 國家資本主義；
- (五) 社會主義。

俄國如此遼闊廣大，如此形形色色，以致社會經濟結構底這各種類型，都錯綜在它內面。特點也就在這裏。

試問，究竟是哪些成份佔優勢呢？在一個小農國家中，顯然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佔優勢，而且它也不能不佔優勢：土地佔有者底大多數，甚至極大多數，乃是小商品生產者。在我國，投機商人時此時彼地在破壞國家資本主義（糧食壟斷，受國家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社手）底外殼，而投機業的主要對象，便是糧食。

主要的鬥爭正是在這一方面開展着。如果按「國家資本主義」這類經濟名詞說來，究竟是誰同誰在進行這一鬥爭呢？是上述序列中的第四種成份與第五種成份作鬥爭麼？當然不是的。這裏，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作鬥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共同攜手，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的國家干涉、統計和監督，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也好，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也好。這乃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許多經濟問題上的錯誤都是由於不了解這一事實才發生的。投機者，奸商，壟斷破壞者——這便是我國「內部」主要的敵人，即蘇維埃政權在經濟設施方面的敵人。如果說，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法國小資產者這班最顯著最真誠的革命家，只想用絞殺個別不多的「要犯」和頒佈大批通告法令去戰勝投機商人，此種願望尙可以原諒的話，那末現在例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純屬空談的態度，只能引起每個有覺悟的革命家的厭惡和嫉視而已。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投機業底經濟基礎，乃是在俄國蔓延得非常廣泛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在每一個小資產者那裏都有自己的代辦的私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小資產階級多頭蛇的千百萬觸角，時此時彼地纏繞着工人中的個別成份；投機業鑽進到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底全部機體內，排擠國家壟斷制。

誰要看不見這點，那他就恰恰因爲自己盲目無能，暴露出自己是做了小資產階級成見的俘虜……

小資產者擁有在戰時用「正當」辦法，特別是用不正當辦法所積累起來的幾千幾千的小存款。這種標本經濟式樣，也就是投機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底基礎。金錢，這是獲得社會財富底證券；千百萬小私有者緊緊地握着這種證券，對「國家」隱藏起來，不相信任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期待」躲過無產階級的大風暴。或者是我們使這些小資產者來服從我們的監督與統計（我們若把居民中佔多數的貧民，或半無產者組織在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那我們便能做到這點），或者是小資產階級必然地和不免地推翻我們的工人政權，如同正是在這小私有制基地上成長起來的拿破崙輩和卡芬雅克⁽³⁾輩之曾經推翻革命一樣。問題就是如此。問題也只是如此……

保存有幾千小款的小資產者，係國家資本主義底敵人，他們唯一是想把這款子用在自己身上，反對貧民，反對任何全國性的監督，而這幾千幾千小款却替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投機業造成若干億萬金錢的基礎。譬如說，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幾天內創造出為數一千的價值。又譬如說，在我國，因爲小投機業，各種盜竊公物行爲以及小私有者破

壞蘇維埃法令和蘇維埃章程的現象，以致這一千的價值中有二百落了空。每個覺悟工人就會說：如果我能從這一千中拿出三百來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組織，那我就要不止拿出二百，却甘願拿出三百，因為在蘇維埃政權下，既然秩序與組織都會整飭就緒，小私有者破壞國家壟斷的行動都會被徹底打破，那末以後這種「貢款」就會減輕，譬如說減到一百或五十，已經會是很容易的任務了。

這個普通的數字實例，——爲了要作極通俗的解釋，我故意把它弄得再簡單化沒有，——也就說明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現時情況底對比關係。工人掌握有國家政權，他們在法權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這整整的一千都「拿上手來」，不讓一個哥比落在非社會主義用途之上。基於政權已實際轉到工人手中這一法權上的可能性，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份。可是，小私有者與私人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却經過許多途徑搗毀法權上的規定，扶植投機業，破壞蘇維埃法令底實施。國家資本主義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就即令（所以我故意舉出上述這種數字，極簡截地來表明這點）那時我們比現在所付的代價會更大一些，因爲「領教」值得破費，因爲這對工人是有好處，因爲戰勝茫無秩序，戰勝經濟破壞與鬆懈現象，比一切都重要些，因爲讓小私有制的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

這乃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絕對會使我們趨於滅亡（如果我們不戰勝它的話）的危險，但是我們支付大款給國家資本主義，這不僅不會滅亡我們，反而能經過這一最可靠的道路，把我們引向到社會主義去。若是工人階級學會怎樣捍衛國家秩序來反對小私有制無政府性，學會怎樣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來安排全國性的大生產組織，那時它就能在各方面——恕我用這樣的話來形容，——都佔上風，那時社會主義底鞏固就會有了保證。

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比我們現時經濟，要高越得不可比擬，這是第一。

第二，國家資本主義內面，並沒有包含任何對於蘇維埃政權是可怕的東西，因為蘇維埃國家是其中工人和貧民政權有了保障的國家。……

爲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們首先舉出國家資本主義底一個最具體的例子。大家知道，這個例子就是德國。那裏存在有現代『最新的』大資本主義技術，以及服從於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的組織。若把上面這加上着重點的字樣刪去，同樣用國家，但已是另一種社會形式和另一種階級內容的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這軍閥的，容克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那你們便可得到社會主義所給予的各種

條件底總和。

沒有建築在最新科學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在產品之生產與分配方面使千百萬人都最嚴格遵守統一定額的這種有計劃的國家組織，則社會主義便無從談起。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點隨時都講到過，所以對於那些甚至連這點都不了解的人（無政府主義者，大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就不值得絲毫費詞了。

同時，若沒有無產階級在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社會主義亦無從談起，這也是最初步的道理。歷史（除了孟什維克這班頭等蠢材之外，任何人也沒期待它會平穩、安靜、輕易、簡單地生出『完備的』社會主義來）演進得這麼奇特，到一九一八年時，却誕生出了社會主義底兩半，彼此隣近着，好像國際帝國主義這同一蛋殼內兩個未來的雞雛一樣。

德國和俄國在一九一八年，是再明顯不過地體現了為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一方面是經濟、生產、社會經濟諸條件，另方面是政治條件。

若是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獲得了勝利，那它也就會輕而易舉地一下子摧破帝國主義底任何蛋殼（可惜，這個蛋殼是由最好的鋼鐵所構成，而不是任何雞雛底力量所能衝破的），也就定會實現世界社會主義底勝利，而不經過困難，或者只經過極小的困難，——

當然，這裏所謂「困難」是指全世界歷史意義範圍而言，而不是指平常小組式範圍的困難而言。

但如果德國革命仍遲延「爆發」，那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學習德國人底國家資本主義，用一切力量來採用這種資本主義，爲了加速野蠻俄羅斯人去採用西歐成果，應該不惜使用獨裁方式，在反對野蠻勢力時，決不拒絕使用野蠻的鬥爭手段。無政府主義者或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若有人（我隨便記起了卡列林和格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所說的話）竟能自矜自傲地議論道，唔，向德國帝國主義「學習」，對我們這班革命家說來，簡直是格格不入的；那就只應這樣回答說：要是認真來理會這班人的意見，革命便會無可挽救地（並且是完全應分地）遭到滅亡。

在俄國，此刻正是小資產者資本主義佔優勢，從這樣的資本主義，無論走向國家大資本主義或走向社會主義，都是走的同一條道路，都是經過同一個中間站口——即所謂「對產品生產與分配上實行全民統計與監督」。誰若不懂得這點，那他或者因不知道實際情形，看不見現成事物，不會辨別真理，或者只局限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抽象的對立性，不去洞悉此刻我國這種過渡底具體形式和階段，而犯了不可饒恕的經濟

錯誤。

附帶說說：這也是使「新生活」報^(三)與「前進」報^(四)派營壘中的優等分子喪失頭腦的同一理論錯誤：其中劣等與中等之輩，因為稟性愚鈍和毫無氣節，已被資產階級所嚇倒，追隨着資產階級底尾巴；而其優等人物則不了解：社會主義底導師們並不是徒勞無益地說到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他們也不是白白強調地指出，新社會之『長時間的臨產苦痛』，並且這個新社會也還是抽象事物，只有經過多種多樣尚未完善的一以求建立某種社會主義國家的具體企圖，然後這一抽象事物，才能體現到實際生活中去。

正因為若不經過為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東西（全民的統計和監督），就不能從俄國現時經濟情況中前進一步，所以用『演進到國家資本主義一方去』的話來自駭駭人，這是理論上的荒謬絕倫之談。其實這也就是不懂得『演進』底真實道路，恰恰在思想上離開這條道路奔竄到『一方』去，而在實踐上這便等於是向小私有制資本主義開倒車。

為了使讀者相信，我還不只在現時，而是當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前，就對國家資

本主義給了『高度』的估計，讓我來摘引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寫的『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⁵⁾這小冊子中的話吧……

『……你試試用革命民主的國家，即是用那採取革命手段來破壞一切特權；不害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民主制度的國家去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即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就必然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

『……因為社會主義不過是由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前進的最近一步而已。』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這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為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見第二七頁和二八頁）

請看，這是在克倫斯基⁽⁶⁾執政時期寫的，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革命民主』國家。我們從這一政治梯級攀登上愈高，我們在蘇維埃中把這社會主義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得愈完備，則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就應當害怕愈少，難道這不明顯嗎？在物質的，經濟的，生產的意思上說來，我們還沒有進

到社會主義的「門階」，如果不經過我們還未達到的這一「門階」，就不能走進社會主義，難道這不明顯嗎？……

還有以下這種情況，也是極有教益的。

當我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與布哈林同志爭論時，他順便指出說：在關於給專家以高度薪俸的問題上，「我們」比「列寧要右一些」，因為馬克思說過，在某種條件下，對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是「從這匪幫手裏實行贖買」（即從資本家匪幫，也就是從資產階級手裏，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生產資料），這裏我們並看不出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

這是一番非常有趣的議論……

……請思考思考馬克思這話底意思吧。

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是壟斷前期資本主義底頂點時期，是當時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國家，是當時就工人「贖買」資產階級所有物而言，社會主義底「和平」勝利最有可能的國家。所以馬克思說：在某種條件下，工人並不拒絕向資產

階級進行贖買。至於對變革底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既沒有束縛自己，也沒有束縛社會主義革命將來的活動家，他極卓越地了解到將來會有某些大批新的問題發生，在變革進程中整個環境會怎樣發生變化，這種環境在變革進程中會如何頻繁而急劇地變動着。

但在蘇維埃俄國，自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自從剝削者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鎮壓下去之後，某些條件業已按半世紀前在英國——假如英國當時已開始和平地轉到社會主義，——本可形成的那些條件底樣式形成起來了，這難道不明顯麼？那時在英國本有下列種種情況能够保證使資本家屈服於工人：（一）由於沒有農民（在七十年代的英國，已經有了一種徵候，可以指望社會主義在農村工人中能獲得非常迅速的成就），以致工人即無產者在全國人口中佔絕對優勢；（二）職工會內無產階級底高度組織性（當時英國在這方面，佔世界上第一位）；（三）無產階級受過歷來政治自由發展的訓練，而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程度；（四）組織得極好的英國資產階級——當時他們是世界各國組織得最好的（現在這個首位已經轉到德國去了）——長期地慣於用妥協來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也就是因為這些情況，當時才能發生此種思想：可能使英國資本家和平地屈服於英國

工人。

在我國，現時因有某些基本前提（十月革命的勝利，從十月到次年二月鎮壓了資本家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而使這種屈服已經有了保障。在我國，有生活貧苦和急速破產的農民援助無產者的這種情形，來代替工人、無產者之佔人口絕大多數以及他們高度組織性的事實，而成為勝利的因素。末了，在我國，雖沒有高度文化水準，却也沒有妥協的積習。如果將這些具體條件加以熟思，那末很顯然的，我們現在能够而且應當做到把這兩種辦法結合起來——一方面要無情地懲治不文明的資本家，即懲治那班不肯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去設想作任何妥協，只是用投機業和收買貧民等手段來繼續破壞蘇維埃設施的資本家；另一方面要與文明的資本家，即與那班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能實行這種資本主義，能以真正用生產品供給千百萬人之大企業底聰明練達組織者資格出現，能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

布哈林是一個學識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以他才提到並完全贊同馬克思這樣教導工人的一番話，說正因為要便於過渡到社會主義，就得保存大生產組織，說如果（這是一種例外：當時英國就是如此）環境會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並在贖買條件下，